

五四时代的我

【编者按】阮毅成、方豪，一个是杭高旧一中时期的学生，一个是省立杭高时期的校长，他们相逢相识在“五四”，都曾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在五四94周年之际，仅以此两篇文章，追念先贤，并助来者。



政界要人 阮毅成

阮毅成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我是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今杭高，编者注：下同)一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年十五岁。

我于民国七年夏季，在杭州的杭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毕业。其时杭州只有四所男子中学，一所是省立一中，另两所是私立安定中学(今杭七中)与宗文中学(今杭十中)，另一所是教会办的蕙兰中学(今杭二中)。

当时的学制，是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三年，合为七年。我幼年人家塾，未进过初级小学，系从高小一年级读起，毕业时为第三名。(第一名为叶国华，第二名为王均棠。)第二高小与第九初小合设一处，地址是杭州佑圣观巷，校长是程培甫先生。

中学尚系旧制，四年毕业。考中学时只考作文一篇，父亲于暑假中延二高的国文教师赵敏哉先生在家补习，每天以春秋左传的题目作文。考后，我先去看赵先生，将文稿请他看。他说：“大体不差，但不算最好，因为对题旨未能充分发挥。”而后回家给父亲看，他说：“题旨未完全弄清楚，且看运气罢。”我听了他们的话之后，颇觉难过。因为我的国文，在小学中一向名列前茅，尤其做左传的题目，更是熟悉。这一次题目出在孟子，竟写得不好，使老师和父亲都感觉不满意，实在惭愧。父亲不许我另考其它学校，只有呆等一中出榜。

出榜的那一天上午，父亲带我到一中门口，看榜的人并不多。我们从后面面向上，一共取了五十名，我是第二十六。父亲觉得有些傲幸，勉励我入校后要特别用功。我内心自是喜悦，回到

家中，家人也都为我高兴。

其时的一中设在杭州直大方伯，北伐以后拆屋开辟马路，名为新民路。而一中却改设到贡院前原第一师范的校址，改名为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简称杭高。一中的原址成为私立树范中学，系许绍棣胡健中诸兄所创办。

我入校时的一中一年级教职员，就我所记得的，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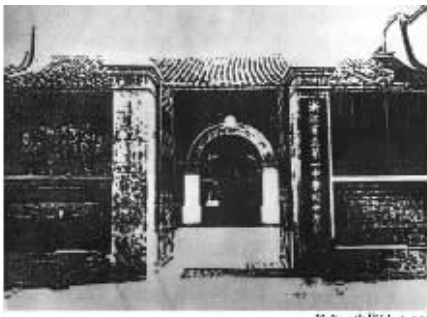
校长 吴文开先生 国文教师 杨学洛先生 英文教师 施少明先生 数学教师 洪镜西先生 博物教师 宋知方先生 历史教师 王梦僧先生 地理教师 钟毓龙先生 修身教师 陈先生 音乐教师 王华恩先生 图画教师 樊希忱先生 手工教师 王伍先生 体育教师 王擎柱先生

同班同学虽录取有五十名，但并未全数报到，实到的只有四十余人。其由浙东各县来的，年龄都比较大。和我同坐一张长橙的是王乃宽兄，他是诸暨人，就比我大四岁。其时我才十四岁，他已十八，相差就觉得很大。因此，他俨然以大哥自居，在校中处处照顾我。他是住校生，我是走读，每天只在校中吃一顿午餐。我在二高的同学，同时考入一中的只有我和另一位，初入校时颇觉得孤单。尤其我们不懂浙东各县的方言，幸而有乃宽兄，否则竟无法和同学们交谈来往。我在一中一学期中，生活很平静，成绩也有进步，但图画手工音乐体育等门，只能勉强及格。

五四运动一发生，我们的平静学生生活，完全变了。

首先是杭州有了学生联合会，学校中有了学生自治会。我先当选了学生自治会的评议员，又当选了出席学生联合会出版委员会的代表，常常要忙着开会。

再则是抵制日货的运动，各校学生分组到



图：中国日报



车站，轮船码头，商店中去检查日货。原有的加以查封，新运到的加以扣留，送到学生联合会去处理。我被派到南星桥车站，接送多少天，并未查到日货。因为这只是从杭州到江干的一个中间小站，平时就没有多少洋货进出。我们这批中学生，只得在车站上捡石子玩，每天等到最后一列火车过站了，才回家休息。

再则是示威游行，为了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为了支持上海的罢课罢市运动，每隔几天就有一次全城学生大游行。我除了要参加游行外，还被推担任草拟传单。传单都是用毛边纸油印的，每次要有新的内容和刺激的语句。而各校所发的传单，无形中还有竞赛，大家都不愿被人批评为平凡不足道。我后来曾将当时各校所发的游行传单，汇集起来钉成一大本，不幸在抗战期中失去了！

还有就是开会听演讲，其时北京、天津、南京、上海，不断地有学生代表到杭州来，报告各地学生运动情况，开会的地点多在平海路省教育会礼堂。

于是，自五月起一直到放暑假，就没有上过几堂课，连学期考试，也在废除考试制度的口号下，没有举行。

过了暑假，我们一班自然地升为二年级。暑假中，学校中照常招生，仍就是考一篇作文。开学时，校中盛传这一年的新生状元，在应考时，是用白话文写的卷子，于是大家都急着要见一见这位榜首。那知道开学后，他来报到了，竟是一位身穿蓝布大褂架阔边眼镜，足穿老

布鞋，并且有些驼背的老少年。他名叫查猛济，字宽之，浙江海宁人。自小在家中延师读书，未读过小学。因而他的国文基础很好，但也只懂得国文，其它功课一概不行。他比我也大几岁，因而在王乃宽兄之外，很快的成为我文学上的大哥。

我们那时之所以惊奇，因为一中的国文教师杨学洛先生，是杭州有名的桐城派。他选给我们读的文章，都是桐城派的名作。杨老师又以书法名，据说他写字是将新笔用剪刀剪去笔尖后才写。他怎么会在入学考试时，将一用白话写的试卷列为第一名呢？是查宽之的白话写得太好，还是杨老师在五四运动后也赶学时髦？我要解答这个谜。在二年级开学后，杨老师第一次上作文课，出了一个题目是“论演说之效果”，我就用白话文写了一篇缴给他。第二次上课的时候，作文发了回来，杨老师仍用旧式圈点批改，有一段连用密圈，最后还批了“了然于心了然于口”八个字。从此全班同学都知道杨老师并不反对白话文，很多人就都改用白话作文，我从此在中学时代，就未做过文言文作文，杨老师也每次给我若干密圈，与很好的评语。

其实，我用白话作文，并不始于五四以后，早在民国六年，我还在高等小学三年级，国文老师张元孟先生就教我们作白话文。张老师的长公子成先生，是校中的英文老师(其时高小有英文课)；次公子代理过我们的算术老师。因之，以年龄推算，元孟先生在当时，应已在六十岁左右。他先写了一篇无怒轩记给我们读，并且在黑板上写着下面一段话：

“学生作文，往往困难万分。其意径笔路塞滞故也。故必以快利之文药之，而后沉？可起。抑近来校中读本，程度过高，实不适用。若必胶柱鼓瑟，是驱忆万子弟于陷阱也。书贾志在求利，而教员不可不负责任，且亦不忍立视其死。故拟此以示诸生，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张老先生要我们每一位同学将这一段话抄下来，送给他看，他在每一张上签了“教正”二个草字。从此他就教我们做白话文，他说：“语言为文字之本，不练习语言而哗然作文者，皆痴人也。”有一次，他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望雨”，我用白话写成答卷，张老先生看了很满意，他在我的卷子后面批了一大段：“区区白话耳，苟非各种文法具备，何以能此。甚矣！即此练习语言，亦有戛戛乎其难之者。后生小子，其可忽诸。”(下接中缝)

“五四青年”方豪的教育之路

密联络一部分北大同学，发动了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7日，方豪即南下天津、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沿途向群众宣传，发表演说，策划南方各省市广大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并在上海晋见孙中山先生，受到孙先生的亲切接见。

由于方豪是全国学生中的领军人物，1919年6月3日，北京学联在北大第一院举行学联会议散会时，方豪在沙滩东口被捕，关押在首都卫戍司令部；这是北京第二次大规模逮捕青年学生的血腥事件。一共逮捕了46名所谓各大专学校的激烈分子，此时担任北京学联会的主席的方豪被认为是“主犯”之一(其余二名“主犯”是工专的夏秀峰和法专的何其伟)，方豪被关押至1920年2月初才被释放。

走上教育之路

与方豪并驾齐驱的罗家伦、傅斯年等，五四后亦各奔前程。不过比起罗、傅二人，方豪没有背靠国民党的高官，也没有奔大陆赴台湾，而是深受蔡元培先生的影响，认为学生有理想、有抱负，是将来国家的栋梁。加之经历五四后，他目睹与感受到的一切，使他更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教育爱国之路。

方豪毕业前的三个多月，安徽发生了一次政治运动。安徽督军倪道珩捕杀了安徽学生联合会主席姜高琦，于是引发了省内一次反军阀、反专制的政治大斗争。安徽学生借鉴北京学生五四运动的经验，认为方豪可以为他们出谋划策，领导他们进行斗争，就派代表到北大请他去安徽第一中学的校长。

当时各省在每一个府(相当于今天的专区或地级市)设有一所省立中学，省立中学的师资设备比当时的私立中学或教会中学要好得多。当时大学很少，省立中学在地方上有崇高的地位。方豪考虑到自己学业尚未完成，距毕业还有几个月，答应以后再考虑。

后来安徽省政府也出面邀请，同时安徽学生联合会再派代表去北京坚请，结果方豪同意了。那是1921年8月的事。任用外省人当省立中学的校长，在安徽教育史上方豪是第一人。从1921年8月到1924年2月，方豪在安徽省立第一中学当了两年半的校长。

浙江省教育厅得知方豪在安徽办学很有成绩，教育有方，厅长张闻生就派了一位姓蔡的督

学厅长的亲笔信来到安徽(其时安徽省会在安庆)，邀请方豪回浙江接办省立第五中学(即今省立绍兴中学)。

方豪是浙江金华人，信中说：“楚材晋用，未免可惜，应为桑梓服务，为本省培养青年学生。”方豪感到盛情难却，就于1924年2月辞职回到浙江，接任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校长一职。刚到绍兴两个月，齐卢战争爆发了，浙江省的中学全部停课，只有方豪所在的第五中学坚持上课，弦歌不辍。一方面固然是全校教职员和学生们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与方豪的声望有关。在学校经费接济不上时，上自校长，下至勤杂工，不分等级一律月支生活费十元，众人一心，同甘共苦。所以在齐卢战争中，只有省立五中从未停课，结果受到当局的嘉奖。

自1924年2月到1927年2月，方豪整整当了三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的校长。

金华地区在浙江省政府工作的开明人士以及沈钧儒、马叙伦等人认为方豪办学成绩卓著，很有办法，一定要他回金华家乡去服务。从此，自1927年3月起到1948年止方豪在浙江省立第七中学(今为金华一中)整整当了二十余年的校长。方豪1927年接任省立第七中学校长时，正值北伐告捷，定都南京。当时政府规定：凡是公教人员一律都要参加国民党，不管你是否愿意。故方豪加入国民党的志愿书就和省立第七中学校长的任命书一同下发，这种入党方式，完全是被动的。

1937年6月，这时浙江省政府已避难金华，浙江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支部筹备处，筹备处主任是宣铁吾，指导员是黄绍竑，他们认为方豪是金华本地人，又已经当了多年的校长，人地皆熟，把他亦拉入团内，可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青年团。于是委任方豪为青年团筹备会干事。但筹备会成立不久，金华中学就迁往乡下，后又由乡下迁往浙东腹地的山区缙云，方豪忙于繁重的迁校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团的实际工作，仅挂了一个虚名而已。

三民主义青年团浙江支部整整筹备了八年，1946年5月才算正式成立，省代表大会选举方豪为监察委员。浙江三青团支部成立了不到一年，就开始闹归并，结果将三青团的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并入国民党省党部，作为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方豪的省党部监察委员的头衔就是这样来的。

1947年，国民党中央大放厥词：提倡民主政治，而且接二连三地搞所谓的民意选举。由于方豪搞教育名声在外，于1947年被金华民众选举为第一届浙江省议会会议员，接着又被选为金华地区的议长。

1948年，方豪又被金华地方民众选举为金华地区国大代表。

方豪当时已看清国民党的腐败、堕落的本质，在历次选举中坚持“三不”：一不靠党(国民党)，二不靠团(三青团)，三不拉拢(请客)。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在历次选举中，他都是由民众自发提名才当选的。

1948年，浙江省政府调他去杭州接任省立杭高的校长，方豪在省立杭高担任校长一直到解放。

方豪在五四运动后即选定以教育为终生职业，到解放时为止，他连续担任了30年省立重点中学的校长，实现了自己的宿愿。解放以后，不是方豪不愿意继续担任校长，而是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一个跟着一个。如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等等，加上他解放前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担任了相关职务，当过国大代表，参议会会议长等，有一连串“头衔”。所以每次政治运动，方豪都无法逃脱挨批、受整的厄运。所幸新中国教育部长马叙伦是方豪的老师，当年在北大教书对方豪十分了解。经马叙伦的帮助，方豪被调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才免遭厄运。学习结束以后，方豪被分配到杭州蕙兴中学教书，终止了他长达三十年的校长生涯。

1955年2月，方豪在杭州逝世，终年仅61岁。



方豪(1894-1955)，浙江金华人，字傲新，又名方新，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金东区澧浦镇方山村(方山)人。当年他可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曾受到孙中山接见。五四运动中，身为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首任主席的方豪与傅斯年、罗家伦都是先锋。五四运动后，他是唯一留在大陆的学生领袖，并投身于教育救国之路，曾担任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校长、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安徽省立第一中等学校校长达30年之久。

五四运动的急先锋

方豪1914年毕业于杭州安定中学(现杭州七中)，入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在校就读8年，先后攻读政治、法律、哲学等学科，知识广博，功底扎实。

在影片《建党伟业》中，方豪大约在第70分钟左右出现，即五四运动前夜陈独秀召集学生领袖开会时。林申饰演的方豪慷慨陈词，说：“领土不整，国家必亡。”然后陈独秀鼓励大家：“同学们，历史的重要时刻到了！”

电影中，方豪的镜头穿插于整个五四运动。他和其他学生领袖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拉横幅、呼口号。随后，他与学生们包围赵家楼，他钻进门缝游说守兵：“同胞们，我们是亲人，我们的枪应该去打欺负我们的列强！”火烧赵家楼之后，方豪还在陈独秀获释出狱后出现了一个镜头。可以说，在这部明星云集的电影中，方豪的出镜率相当高，台词也多，算是戏份颇重了。

历史上，1919年，《巴黎和约》签订后，其秘